

李大钊与毛泽东的三重关系

周良书¹, 孙 延²

(1.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1; 2. 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李大钊和毛泽东都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前者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第一人,后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集大成者。毛泽东与李大钊的交往经历,对李大钊历史观、世界观、人生观的继承,对李大钊关于中国革命对象、动力和策略等思想的发展,是其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集大成者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的这种交往互动、代际传承和知识创新,也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必须关注的内容。

关键词:李大钊;毛泽东;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21)04-0016-08

DOI:10.16160/j.cnki.tsxyxb.2021.04.002

On the Tripl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 Dazhao and Mao Zedong

ZHOU Liang-shu¹, SUN Yan²

(1. School of Marxism,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Li Dazhao and Mao Zedong are both founders of CPC, the former being the first person to spread Marxism in China and the latter being the epitome of Marxist sinicization. Mao Zedong's interaction experience with Li Dazhao, his inheritance of Li's views on history, world and lif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i's ideas about the object, dynamics and strategies of Chinese revolution are important factors for him to become the epitome of Marxist sinicization. Their interaction, inter-generational inheritance and intellectual innovation are also an important part for the study of CPC's intellectual history.

Key Words: Li Dazhao; Mao Zedong;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PC)

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第一人,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深深地影响着“未来整整一代中国共产主义领导人的思想和行动”^[1]。其中最杰出的一个,就是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年轻助手——毛泽东。那么,毛泽东与李大钊都有哪些人生交集?他在与李大钊的交往中学到了什么?李大钊又有哪些思想被毛泽东继承和发展?分析和思考这些问题,对

于推进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厘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脉络,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交往经历

出生于1889年10月的李大钊,比毛泽东年长不到5岁,但两人身上却显现出两代知识分子的不同特征,尤其表现在两人对待传统文化和孔子的不同态度上。李大钊接受了十年系

作者简介:周良书(1975—),男,安徽肥东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执政党的建设研究。

统的私塾教育,1902年还参加了当年的科举考试,因“污卷”等原因落榜,多年后他在《狱中自述》中回忆起这段经历仍感遗憾。李大钊和新文化同仁一样,为变革社会疾呼打倒孔子;但又与新文化同仁不同,他在批判孔子时仍抱有敬意,看到其作为中华文化的符号对世界文化的影响,认为对孔子应该客观地作出评判,这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毛泽东是受新文化运动影响成长起来的五四青年的代表。从8岁起开始接受传统私塾教育直至13岁,毛泽东白天“读孔夫子的《论语》和《四书》”^{[2]120},早晚干农活,然而他从一开始就不喜欢儒学。他说:“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2]108}青年毛泽东的偶像起初是梁启超和康有为,后来转为胡适和陈独秀,他苦苦寻求救国救民的“大本大源”,身上体现的是不受传统束缚,冲破一切的斗争精神。

1918年10月刚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不久的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办理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事宜。作为借钱来京的“北漂一族”,与蔡和森等同学八人住在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狭小的房子里,毛泽东最急需的是要找到工作以解决生计问题。后经老师杨昌济介绍,他认识了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毛泽东说:“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有八块钱。”^{[2]142}李大钊的帮助也许是出于对年轻人的关爱,一如他对青年群体的看重。而毛泽东无疑对李大钊是感激万分的。1949年3月在中共中央即将进驻北平时,毛泽东回忆起自己30年前的北平生活,仍然记得“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3]125}。

李大钊与毛泽东的生活环境不同,人生经历不同,因而产生不同的思想观念,呈现不同的性格特征。但李大钊和毛泽东却在纷繁复杂的历史大潮中经过比较辨析,先后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是在留日期间迈出了人生的关键一步。1914年春,在北洋法政专门学堂

求学6年后,李大钊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就读政治本科。这段留学经历对于李大钊至关重要,虽然由于参加政治运动,他于1916年就弃学回国未能完成学业。但是在日留学期间,他受到日本学者河上肇、幸德秋水、安部矶雄等人影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李大钊参加了中国留日学生组织的神州学会和中国财政经济学会,进一步积累了政治经验;结交了章士钊、高一涵等革命密友,完成了政治立场由原来的拥袁到反袁、政治主张由共和宪政到激进民主主义的转变,这为回国后参加新文化运动、领导五四运动、筹建中国共产党打下了坚实基础。

毛泽东的转变则与李大钊密不可分,李大钊是其引路人,促成了毛泽东的思想转变。从1918年10月到1919年3月将近半年的时间里,毛泽东与李大钊两人同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由于工作关系,时常到李大钊处请教”^{[4]38}。在李大钊推荐下,毛泽东阅读了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加入了哲学研究会、新闻学研究会,并在天安门广场亲耳聆听了李大钊《庶民的胜利》的演讲^[5],认真阅读了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等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其思想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2]148}。1919年12月,毛泽东因湖南驱张运动第二次前往北京,这段时间他与李大钊有更为密切的接触。在李大钊的影响下,毛泽东“用心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刊,“热心地搜寻那时能够找到的为数不多的中文本的共产主义书籍”^{[4]55-56}。这段交往经历,以及后来在上海期间与陈独秀的交流和探讨,共同促使毛泽东的思想发生巨大转变。“到1920年冬,他从理论到实践上已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6]。

此后,二人分开各自从事革命宣传实践活动。李大钊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党的创立做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工作。同时他还积极为《甲寅》等进步报刊撰文,与陈独秀等共同创办《每周评论》,以传播马克思主义和进步思想。而毛泽东则返回湖南,继续领导

驱张运动和湖南人民自治运动。在积极组织新民学会活动的同时,毛泽东还于1920年7月发起文化书社,这是他当时计划做的两件事中的重要一件^{[4]78},“以运销中外各种有价值之书报杂志为主旨”^{[4]68},经售包含《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等进步书籍、报刊。毛泽东对此寄予厚望,认为是当时要做的最经济有效的基本事业^{[4]77}。而李大钊也再次以实际行动支持毛泽东,他和陈独秀等为其提供信用介绍,使得各店免去押金开支。

当李大钊在北京发起共产主义小组时,毛泽东也在湖南长沙以新民学会骨干成员为基础创建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7月,毛泽东和何叔衡作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遗憾的是,李大钊因为领导北京教育界的索薪斗争,未能参加这个开天辟地的会议^{[7]136}。但这并不影响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缔造者的身份和地位。事实上,这一时期李大钊不仅直接参与筹建党的工作,而且还在高校公开讲授“唯物史观”等马克思主义课程,以培养潜在的信仰群体。

虽然李大钊和毛泽东因故都没有参加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但他们都参加了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的党的三大。这是李大钊首次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也是他与毛泽东时隔三年之后再次碰面。在此之前,毛泽东已于4月间由中共湘区委调入中央工作,在三大上成为党的中央局五名成员之一,并担任中央局秘书,协助陈独秀处理中央日常工作^{[4]112}。李大钊在三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西湖会议和此次全会上,他为大会的召开以及推动国共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三大召开之前的1921年12月和1923年1月,李大钊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越飞介绍给孙中山,孙中山分别在桂林和上海与两人会晤,促成了孙中山和国民党联俄联共方针的转变。李大钊在1922年8月召开的西湖会议上提出三点关键性意见^{[8]226},指出共产党员应该站在革命

运动的前列指导和参加革命,并促使会议通过了国共双方以党内合作方式开展合作。在党的三大上,毛泽东和李大钊形成默契,共同坚持国共合作的正确方针,共同反对不合作与放弃共产党领导的两种错误倾向。

党的三大后,李大钊和毛泽东共同留在广州工作。他们和加入国民党的其他中共党员协商一致,共同起草给孙中山先生的信件,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态度,推动国民革命向前发展。1923年7月,李大钊和毛泽东先后离开广州。李大钊回到北京,在北京会见鲍罗廷,后赴上海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毛泽东则调到上海党中央工作。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两人分别作为北京和湖南国民党代表参加,李大钊成为国民党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毛泽东成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李大钊与毛泽东都是大会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李大钊此外还身兼宣言审查委员会、宣传问题审查委员会委员^{[7]183}。在这次会议上,两人共同批驳国民党内反对共产党员跨党和按比例选举党员等主张,坚持国共合作的正确立场。会后,李大钊回到北京。是年6月,他作为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出访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并在第二十二次会议作报告,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介绍中国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的有关情况^[9]。毛泽东则在国民党一大后回到上海,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一度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后因工作过于劳累患病,年底回湘疗养。

李大钊和毛泽东最后的“交往”是作为代表共同参加1925年1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四大与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二大这两次重要会议。在这两次会上,他们都坚决主张对国民党右派作必要斗争,并且都很重视农民阶级的革命作用。会后,李大钊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留在北京指导工农革命斗争,为冯玉祥制订“固甘援陕、联晋图豫”军事战略并为其采纳,促成冯玉祥的革命性转变,为策应国民革命

军北伐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则先后在广州和武汉工作,担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和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创办《政治周报》宣传党的正确主张,为反对国民党右派坚持革命发挥了积极作用。1927年4月6日,李大钊在北京被捕,4月28日同其他19名革命者一起英勇就义。1927年的毛泽东也遭遇了被清乡队抓住、死里逃生的经历^{[2]157}。毛泽东“翻山越岭,连夜赶路”之后,继续投身发动湖南秋收起义,并由此开启井冈山的斗争和中国革命新道路的不懈探索。

二、思想传承

在20世纪之初的中国,李大钊走在时代前列,用自己的生命写下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序言和第一乐章,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思考更是深刻影响到一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毛泽东说,李大钊“是我真正的老师”,“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3]125}。事实上,毛泽东不仅继承了李大钊的历史观、世界观、人生观,而且还将之发扬光大,并固化为中国共产党人共有的思想传统。

第一,李大钊是近代中国系统介绍唯物史观第一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引入,首先思考和关注的是唯物史观。这种理论宣传和知识普及,对毛泽东的思想转变影响很大。早在1921年1月21日致蔡和森的信中,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唯物史观为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动摇。”^{[10]4}这一思想观念在毛泽东心目中是根深蒂固的。直到井冈山时期,在给林彪的信中,他

仍然强调“我们是唯物史观论者”,“凡事要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相”^{[10]92}。毛泽东不仅体认唯物史观,而且还十分注重践行这一历史观念。比如,他阅读二十四史,就很注重坚持历史主义,运用新的史观,从旧典籍中寻找解答现实问题的答案。在延安时期,他还把这种方法概括为“古今中外法”^{[11]406},认为需要运用这一方法,系统地、全面地研究党的历史,“研究我们党在各个时期的策略路线,研究各个个别的问题,如军事问题、肃反问题、农民土地问题等”^{[11]407}。正是由于毛泽东掌握新的史观,运用新的方法,才使他对革命的认识超越同时代人,并逐步形成指导中国革命的“救世良方”^①。

毛泽东对李大钊思想的传承,还体现在他对李大钊民彝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民彝观是李大钊“早期政治思想的核心部分”^[12],李大钊借用传统文化中民彝这一术语,指称庶民、平民、人民的观念,将其看作“是现代社会上一切构造的惟一的基础”^{[13]262},提出了平民主义的主张^②。毛泽东受到李大钊的影响,因而也特别强调平民主义。1919年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就提出过这一主张,认为这是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14]293}。毛泽东十分注重民众的力量,认为“革命成功,尽在民众”^{[10]53},并且“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15]136}。在延安时期,毛泽东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党的群众路线,使之成为毛泽东思想三个活的灵魂之一。

① 从瞿秋白和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对比可以很清楚看出这一点。瞿秋白借鉴俄国革命经验,分析中国农村状况,他关于农民问题和武装斗争等问题的认识高度在当时都是卓越的。然而只有做过湖南农民考察的毛泽东,做出农村阶级和革命状况的分析,是几乎可以马上用来指导农村农民革命的方法总结。也因此,瞿秋白亲自为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出版作序。瞿对毛泽东评价很高,说“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泽东”。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册)》。

② 平民主义是五四时期一种很有影响的社会思潮,李大钊在当时的平民主义思潮中独树一帜。他较早是用“民治主义”“民主主义”“德谟克拉西”等词来指称平民主义的。李大钊认为的平民主义,是一种世界潮流,“是一个精神的风习,是一个生活的大观”,是一种通过妇女解放,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的最高政治追求。

当然,毛泽东对李大钊思想的传承,最为重要的还是他坚持李大钊倡导的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思想。李大钊早年曾受到朱舜水的影响^①,十分重视实际效用与事功,认为“凡一种学问,必于实际有用处”^{[8]194}。在“问题与主义”的关系上,他主张“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13]50},认为理论与实际二者同等重要均不可偏废。这一思想后来被毛泽东加以继承和弘扬。

其实,毛泽东也一直十分重视实际问题的研究,还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就读时,不仅与萧子升、张平子等好友长时间谈论问题,甚至还筹划成立专门的“问题”研究会,列出要研究的大小“本源”问题一百四十四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国际等各方面的实际问题,引起北京学界的重视,刊登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到北京以后,毛泽东受到李大钊影响,开始逐渐接触马克思主义进步思想,于是在“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中,他毫无疑问是站在李大钊一边,认为不能只研究具体问题而远离政治生活,而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付诸具体行动。同时毛泽东也十分注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运用。他后来甚至认为,“党在过去犯过许多大的、小的、‘左’的、右的、不合于马克思主义原则性的错误”,党需要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加以解决和防范,“这就是我们党的理论与实际的发展观”^{[10]507}。

第二,李大钊关于“第三种文明”的论述,主张中西文明互鉴的宏大视野为毛泽东所继承,这为毛泽东后来坚持独立自主、探索中国特色革命和建设道路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大背景下,李大钊提出了既不同于东方文化派顽固坚守传统,也不同于全盘西化派中国“样样不如人”的“第三种文明”主张^{[16]340}。在借鉴近代西方先进文明的同时,他主张坚守中国文化立场并着眼未来,希望

复兴的中华文明能够对改造世界文明再次作出贡献^[17]。同样地,对于社会主义制度在各国的实践,李大钊也认为要坚持共性与特性的统一,“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8]248}。也就是说,中国革命要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而不是盲从别国的经验。李大钊的这一思想和立场为后来中国共产党人接受并继承下来。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毛泽东一面强调从中国实际出发,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制定方针政策;一面又主张“洋为中用”,特别主张借鉴西方尤其是苏联革命的经验。正是坚持这一原则和思路,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开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又继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进一步提出要“以苏为鉴”,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而拉开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序幕。

李大钊坚持用联系、发展的眼光观察世界,因而能够认识到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能够在第一时间注意到与中国国情相近的俄国革命的意义。李大钊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将这种“世界眼光”留给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毛泽东从未将中国问题单纯看作中国自己的问题,而是强调解决中国问题必须与世界相联系。早在1921年1月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的发言中,他便将“改造中国和世界”作为新民学会的方针,认为“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10]1-2}。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毛泽东更是密切关注世界局势变化,分析这种变化对党的革命事业的影响,考虑中国共产党可能的政策应对。比如,抗日战争爆

① 李大钊早年撰写《朱舜水之海天鸿爪》介绍朱氏生平事迹。李大钊留学日本除了向往日本早稻田大学诸名师外,也存有到日本寻找客死日本的朱舜水遗迹的想法。

发后,他敏锐地观察到“中国的解放运动与世界的解放运动是密切联系着”^①,所以适时提出建立整个中华民族,并联合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和地区组成世界抗日联合战线的主张。直到晚年他都还坚持这一思考问题的方式。比如,当时面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威胁,毛泽东在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时正式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18],认为要广泛团结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为新中国建设创造和平安全的外部环境。

第三,李大钊的奋发有为的人生观和青春宇宙观给毛泽东以极大触动,成为毛泽东奋斗终生的精神力量。李大钊认为宇宙是日新月异不断发展的,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李大钊号召已辈需要利用现在生活加以创造,“使后世子孙得有黄金时代,这是我们的责任”^{[8]16}。毛泽东认同李大钊的这一观点,认为“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14]394}。李大钊还寄希望于青年,希望青年能够奋发抓住宝贵的“今”,改变当前“老辈把持”“古董陈列”之中华,以“人人奋青春之元气,发新中华青春中应发之曙光”,将人之青春与国家之青春相联系,勉励青年以青春之我,再造青春家庭、国家、民族^{[16]328}。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奋发有为的青年。当1915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时,毛泽东愤而写道:“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4]17}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毛泽东指导湖南学联发起湖南各界联合会,并和学联干部利用暑期,组织青年学生到城乡、车站、码头做爱国反日宣传,开展湖南学生和各界群众反帝爱国运动。在受到李大钊影响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转变之后,他发出:“天不要怕,鬼不要

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14]292}这样振聋发聩的疾呼,充分体现了一名爱国青年勇于担当时代大任、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议的报告上,回顾了党的艰辛发展历程。在谈到自己成长过程时说,近代以来的中国一般人包括他自己在内,“也不知道世界上有马克思其人”,“我们那时候长得很大了,还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帝国主义,什么马克思主义”^{[19]290}。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李大钊、陈独秀这一群人“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19]294}。由此可见,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传播,对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有直接影响;李大钊的历史观、世界观、人生观,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正处于人生关键期的毛泽东。

三、知识应用

毛泽东是在李大钊等影响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但与李大钊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相比,毛泽东更多关注“马克思主义从传播到实践的转变”,其思想也“更具有实践性”^[20]。正是经由实践这个关键环节,毛泽东才得以在更深层次上继承和发展李大钊的思想,并进一步将之发展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这主要体现在毛泽东对李大钊关于革命对象、革命动力和革命策略这三个彼此联系、逐次递进问题认识的发展过程中。

第一,毛泽东把李大钊提出的革命任务,反对“外来压迫”和“国内武人军阀”^{[8]112-113},概括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

① 毛泽东习惯于将中国问题放在世界政治舞台上观察,因此即使在抗日战争这样特别艰苦条件下,也非常注意对世界政治局势的了解。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描写了对毛泽东的印象,其中一条就是:“我发现他对于当前世界政治惊人地熟悉。……他对英国的工党很感兴趣,详尽地问我关于工党目前的政策,很快就使我答不上来了。他似乎觉得很难理解,像英国那样工人有参政权的国家,为什么仍没有一个工人的政府。……他对于罗斯福总统的看法是令人很感兴趣的。他相信罗斯福是个反法西斯主义者,以为中国可以跟这样的人合作。……毛泽东读过许多关于印度的书,对于那个国家也有一定的看法。”

大山,解决了分清敌我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十月革命以后,李大钊关注和研究俄国革命,由对俄国社会党运动的一般介绍,转向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重点介绍,在这一过程中李大钊思想发生急剧的变化^[21],逐渐认识到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外部敌人。西方列强“在中国伸张势力的竞争虽然极烈,而于保持增进列强在中国的势力则全一致”^{[8]129}。反动军阀则是中国革命的内部敌人。认为中国有的“只是武人专政的政治”,“也可以叫做武乱”^{[13]84}。

毛泽东对革命对象的认识与李大钊是一致的。早在1919年7月21日,毛泽东就在《湘江评论》上著文指出,帝国主义“实贻毒于国际局势”五十年余^{[14]343}。毛泽东的两次北京之行,和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交往,更是加深了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并最终得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者相互勾结,都是中国革命主要敌人的正确判断。1923年4月10日,毛泽东在《新时代》创刊号发表《外力、军阀与革命》文章,通过分析中国社会经济现象,认为“中国目前及最近之将来”,一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二是“军阀统治”,“外力和军阀勾结为恶,是必然成为一种极反动极混乱的政治的”^{[10]12}。

不过此时的毛泽东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的现实尚未提出根本有效的解决方法。但在其后不久的1925年冬,他写的《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两篇文章,就已经对李大钊和自己原有观点有所发展,认为必须“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15]3}，“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敌人”；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最接近的朋友”；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15]9}。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继续发展这一思想，最终将革命对象界定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

义,为制定革命政策提供了根本前提。

第二,毛泽东继承并发展李大钊对工农革命力量尤其是农民革命主力军的认识,并在实践中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开辟了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李大钊深刻认识到工人阶级的解放不仅需要工人阶级的觉醒,更需要工人阶级团结组织起来^{[13]348}。因此,党成立后不久,他就组织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策划工人罢工,领导工人运动。当时李大钊和毛泽东分别担任北京分部和湖南分部主任^{[4]84},领导所在地区的工人运动。李大钊组织成立长辛店铁路工人俱乐部等工人组织,领导北方各地铁路工人革命运动^{[7]152},推动中国北方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党成立后,毛泽东在湖南恢复和开办工人日校、夜校,还多次深入安源煤矿等地的工人群众进行宣传动员。在毛泽东影响下,湖南劳工会领袖黄爱、庞人铨接受党的领导,对湖南劳工会实施改组,在工人群众中大大增强了党的力量^①。李大钊和毛泽东还利用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十月革命等有利时间节点积极宣传党的政策,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

在中共党内,李大钊较早认识到农民阶级的革命力量。为此,李大钊号召革命青年到农村去,认为农村才是青年安身立命的地方。随着国民革命的深入开展,李大钊对农民问题的认识有了新的发展,他将土地与农民问题相联系,认为“耕地农有”是中国农民,尤其是广大贫农的急切要求。如果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把广大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那么“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22]。

毛泽东是党内农民问题专家,他生于农村,长于农村,热爱农村,了解农村,并很早就对湖南农村状况进行过调查研究,因而能够将李大钊关于农民问题的认识引向深入。毛泽东认识到“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若无农民阶级从乡村中打倒宗法封建地主阶级,则“军

① 1922年12月23日北京《晨报》报道说:毛泽东在工人中威信很高,“工人都以毛之意见为从违,毛之所可,工人亦从而可之”。

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10]39}。毛泽东不仅善于从革命实践中总结经验,围绕“土地农有”制定相应的政策并不断调整——《兴国土地法》修改了井冈山土地法“没收一切土地”的不合理政策,而且还主张针对农村不同的阶层状况实行不同的革命政策,最终形成以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为基本内容的中国革命新道路。

第三,李大钊主张革命阶级大联合,他的革命实践尤其是国共合作实践的探索,为毛泽东形成统一战线路线方针提供了宝贵经验。李大钊很早就提出“大联合”的口号,希望促成革命力量的大联合^{[13]181}。党成立以后,在领导中国革命实践中,李大钊提出“中国这样的被压迫的民族国家的全体人民”,“应该赶快的不踌躇的联结一个‘民主的联合阵线’”^{[8]124};应该“让民众——反抗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的民众,是工人、是学生、是农民、是商人——〈那〉集合在国民党旗帜之下,结成一个向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战的联合战线”^{[8]209}。

李大钊的上述思想,尤其是国共合作的主张为毛泽东所继承和发展。毛泽东也同样认识到革命的敌人是凶残而强大的,革命需要各阶级的联合。1919年他在《湘江评论》第二、三、四号连载《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指出民众大联合是改造国家和社会的根本方法,作出了“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的判断。李大钊主编的《每周评论》对此评论说: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是现今的重要文字,期望能够引发更广泛的“湖南各界联合会”^{[23]53}。

1923年毛泽东和李大钊曾同在广州国民党总部共事,这使得毛泽东有更多机会了解李大钊关于国共合作的思想和主张。这为后来毛泽东制定“统一战线”策略方针提供了前提条件。尤其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一方面指出关门主义是“孤家寡人的策略”,“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15]155},另一方面也批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方针。在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根据革命发展,将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进一步加以区别,在正确处理与国民党的政党关系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关系基础上,建立巩固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1949年6月30日,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进一步将这一政策发展为“国内,唤起民众”“国外,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样国内和国际相结合的统一战线方针。于是由李大钊开创、毛泽东等发展的统一战线政策,就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法宝”之一,而且还被赋予了一种“世界性的意义”^{[23]191}。

总之,在中共历史上,李大钊和毛泽东都是那个时代的中心人物。毛泽东与李大钊的交往经历,对李大钊历史观、世界观、人生观的继承,对李大钊关于中国革命对象、动力和策略等思想的发展,是其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集大成者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的这种交往互动、代际传承和知识创新,应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必须关注的内容。

参考文献:

- [1] 莫里斯·迈斯纳. 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M]. 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3.
- [2] 埃德加·斯诺. 西行漫记[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 [3] 李银桥. 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
-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 [5] 金民卿. 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转变之路[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244.
- [6]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50.
- [7] 《李大钊年谱》编写组. 李大钊年谱[M].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下转第30页)

民族复兴、亚洲联合、世界联邦几个阶段发展而成,循序而进,不断深化,最终成为李大钊致力于民族解放事业并为之献身的思想基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虽因李大钊为共产主义事业过早地献出宝贵生命,其共同体思想未能真正付诸实践,但李大钊共同体思想中以民主、平等、自由为核心的价值理念以及将个性解放、人类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关怀的理想追求,始终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为中国共产党开拓革命道路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动力,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

参考文献:

- [1] 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2] 朱成甲. 李大钊传(上)[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450.
- [3] 张三南,吕伟波. 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探析[J]. 甘肃社会科学,2014(4):51-54.
- [4] 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第 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5] 郑师渠. 中华民族实现由自在转向自觉的鲜明标志:论李大钊的《新中华民族主义》[J]. 史学史研究,2020(4):17-20.
- [6] 王锐. 锻造“政治民族”: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的理论意涵[J]. 开放时代,2019(2):122-135.
- [7] 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8] 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第 4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9] 全华. 1924 年李大钊在苏联的经历及相关文献研究[J]. 毛泽东研究,2020(6):41-51.
- [10]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11]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 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12] 侯且岸. 李大钊民彝思想与中国近代民主政治建设[J]. 北京党史研究,1994(6):25-30.
- [13] 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14] 毛泽东. 毛泽东早期文稿[M]. 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 [15]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6] 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17] 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第 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11.
- [18]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 8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41-442.
- [19]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20] 丁晓强. 近世学风与毛泽东思想的起源[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136.
- [21] 张静如,马模贞,廖英,等. 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51.
- [22] 李大钊. 李大钊全集:第 5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08.
- [23] 罗斯·特里尔. 毛泽东传[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李秀荣)

(责任编辑:李亚平)